

荀悦与中古儒学

陈启云 著
高专诚 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

荀悦与中古儒学

陈启云 著

高专诚 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荀悦与中古儒学/陈启云著.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0.7

ISBN 7-5610-4022-9

I. 荀… II. 陈… III. ①荀悦-哲学-研究②儒家-研究-文集 IV. B234.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4616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网址: <http://www.lnupress.com.cn>

Email: mailer@lnupress.com.cn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金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1

印数: 1—3000 册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雪枫

责任校对: 陈 佳

封面设计: 邹本忠

定价: 24.00 元

英文版自序

在本书付梓之时，我谨以至诚表达我对于钱穆教授（香港新亚学院和新亚研究所创建人）和杨联升教授（哈佛大学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的诚挚谢意。钱教授大约在18年前引导我研习中国历史；杨教授则指导我完成了哈佛大学的博士课程并给予我不断的指教和帮助。本书是献给他们两位的。

本书部分依据了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研究。我很感谢哈佛燕京学社以及哈佛人文和科学研究生院给予我的奖学金和出差补助金，资助我完成学业和研究。我还想对罗伯特·海托华（Robert Hightower）教授和格伦·巴克斯特（Glen Baxter）先生表达我的谢意，他们分别阅读了我的博士论文草稿并提出批评意见，还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建议和帮助。我也非常感激我的朋友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Dreyer）教授（目前在迈阿密大学），他阅读了我的学位论文的全部草稿，并以种种方式帮助我改进英文风格。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大部分是在马来亚大学教书时写成的。我很感谢那里的同事们的帮助，以及大学图书馆允许我使用它们的藏书。我特别感激汉堡大学的沃尔夫冈·弗兰克（Wolfgang Franke）教授，他当时是马来亚大学的访问教授，我在那里工作期间，他把德国学术界与我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介绍给我。本书提及的许多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的著述是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问时查阅到的。我愿对吉川幸次郎教授、宫崎市定教授，特别是平冈武夫教授表示谢意，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和宝贵帮助。

我把原来的博士论文修订成现在这本书是在加州的圣巴巴拉

完成的。我十分感激圣巴巴拉的加州大学 1968/70 年度的学院研究基金以及 1969 年夏季的研究奖学金，使我能够拓宽研究领域并把我的学位论文重写成现在的形式。我最为感激的是我在圣巴巴拉历史系的同仁们，特别是许中约教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我还想感谢罗纳德·哈撒韦（Ronald Hathaway）夫人对我的英文风格所作的修正润色。

最后，我要感谢剑桥中国历史、文学和政治制度研究系列丛书的编辑狄尼斯·特维切特（Denis Twitchett）教授的建议和学术批评，他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和编辑本书的打印稿。我还要真诚感谢出版社的审稿人迈克尔·洛伊（Michael Loewe）先生、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纽约编辑科林·琼斯（Colin Jones）先生，以及英格兰剑桥出版社的出版人和总编辑迈克尔·布莱克（Michael Black）先生，他们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宝贵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难以想象本书何时才能出版以及怎样才能出版。

要一一列名拜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是不可能的，他们之中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学术界的同仁。他们聚成一个社会文化群体，使我能在其中获益匪浅。

当然，本书仍有不足之处，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加州，圣巴巴拉

C. Y. C

中译版自序

本人治史，早期考证政治制度，次则析论社会经济，再则潜研思想文化。这本书的英文原稿，Hsun Yueh (AD. 148 - 209): *The Life and Reflections of An Early Medieval Confuci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是本人由研究社会经济史转而关注思想文化史的代表作，也是本人从多方位宏观视野考论思想文化的第一部书。这种几经转折的治学多元方位和视野，使书中从宏观两汉的政治、社会、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变化，到微观荀悦在《汉纪》和《申鉴》中片言只字所蕴含的心境意态，都有不少和前人不同的理解。今天看来，这些理解仍然值得向本书中文版读者略作介绍。

在宏观论题中，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王莽政权和“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的考证分析。过去传统学者认为王莽是诈伪篡逆，而东汉的光武和明帝、章帝则是明主贤君。这种看法早已被现代史学界推翻。目前很多人都知道，王莽改革的失败，东汉光武帝恢复刘氏政权的成功，和当时士族大姓势力的兴起有密切关系，而士族大姓又和儒学有密切关系。由此，很容易推想到儒学是“反改革”、“保皇”、支持“大地主、大宗族”的“保守、反动”的“政教合一”的学说。

本书从“中距分析”(Medium-rang analysis)研究，指出两汉儒学主要是代表了当时新兴士人的“改革理想和精神”。从西汉武帝时开始，至元帝时，这种改革理想和精神达到高潮，而儒学之士在现实中的地位也达到了巅峰。根据一般想法，(如 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儒士成为现实中的“既得利益者”以后,思想便会日趋保守,成为现实利益的代言人。西汉末期儒士也的确有这种趋向。但西汉晚期的儒士却同时保持了高度的改革理想和精神,甚至地位越高,改革的理想越高昂。最后,本来是温和切实的改良精神,也变成了要求以“改朝换代”的方式去实现“天下大同、盛世太平”的不切实际的极端“理想主义”。王莽的得势,在现实上代表了儒士的地位和力量的巅峰,在精神上代表了儒家改革理想的极至。而王莽的失败,则显露出儒士在现实权力架构和政治运作中(包括立法的原意)的弱点和缺失,以及儒家的改革理想和现实脱节的悲剧后果。

王莽改革的失败,对东汉乃至中华中古思想文化更深沉的影响是儒家改革理想的幻灭。作为汉儒改革理想核心的“今文经学”丧失了改革的信念精神以后,在东汉时徒存外表躯壳,其学术地位被“述古、信古、好古”的“古文经学”所取代。支持儒家“今文经学”改革精神的“太平、大同、大一统”等理念亦名实俱亡。在现实政治上,帝国朝廷的“大一统”权威,为地方主义所蚕食;在学术思想上,《庄子·天下篇》和《汉书·艺文志》所称道的,以“六艺经典统摄诸子学说”的“大一统”汉代儒学亦分化为“仕进”和“退隐”二途,对“功业”、“德操”、“修文”各有不同的关注,并发展出“法家型”严刑治国和“道家型”独行自高的两极意识。

改革理想和精神的丧失,决定了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朝政的“保守主义”性质。不管是光武的崇儒,抑或明、章的尚法,他们的改革,只是对现实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反应。这种缺乏远大理想和宽宏视野的政策措施,是导致东汉衰落和终于灭亡的“中距程”原因。

与两汉大一统政权的衰亡同时发生而走向适适相反的,是士族门第势力的兴起。关于在中古时期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士族门第

的属性，当代中、西学者大约有三种不同看法：（1）从经济基础看，这些士族的主要属性是“地主阶级”，与欧洲中古时期封建贵族的“领地”经济基础相同；（2）从政治地位上看，这些士族的主要属性是“官僚集团”，与近代西方“官僚集团”的政治权力基础相同；（3）从文化身份上看，这些士族是“文化精英”，和西方中古时期的僧侣和近代的知识分子的素养、身份和功能相似。本书对颍川荀氏的个案研究，详细考析了此名族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政治力量和学术文化等的互动作用和变化发展。

颍川荀氏家族对东汉魏晋王朝的兴替和中国中古士族政治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这常常为治史者所忽略。

荀氏诸人，生当乱世，风云际会，对于当时几次重大政治事件，均直接参与。对于这些事件的形成和发展，荀氏家族负有很大的责任，并且家族本身也受到了政治影响，其宗族组织，政治及社会地位，以及思想学术的传统，也产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从世局的变化里可以研究和了解当时荀氏诸人的心态和思想；从荀氏诸人的心态和思想亦可以研究和了解汉末士大夫的风气和政治局势。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发生的第一次党锢事件，李膺、陈寔等被罢免禁锢；还有许多次要人物离开首都，回到故乡。这些人回到故乡后的活动，大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设馆讲学、聚集生徒，如李膺“教授千人”；第二类在地方交结官府，如杜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第三类在地方交结豪强大族，《世说新语》里记载陈寔屡次拜访荀淑的故事就是例证。（这几件事的年代都有问题，因为《后汉书》记载党锢事件有很多错误和混乱的地方）。这几个人都是颍川郡的，而颍川荀氏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被牵入了政治漩涡。

颍川郡在汉代是一个遍布豪强，很难治理的地方。在前汉曾有一个太守用离间的方法，使这些豪强大族互相仇恨和斗争，结

果弄得地方政府分崩离析。后来又有一个太守以礼义相劝谕，使豪族们结为姻好。西汉中叶以后，儒士的声威大盛，有很多豪强接受了儒家思想，变成半吊子的儒士。这些颖川豪强在“礼义”的大前提下互相和好，便是一例。而早期荀家（以荀淑为家长），就是这种豪族。

地方豪强和中央政治人物结合的结果是，地方豪强受到后者影响而注意国家政治，中央政治人物得前者人力物力的支持而增强其政治力量。二者长期接触的结果是地方豪强的士大夫化和中央士大夫的豪强化。这种结合产生了六朝的士族政治，真可谓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据说，陈寔与荀淑之会，甚至影响了天文的变动。《世说新语》：“太史奏真人东行”；《续晋阳秋》：“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贤人聚。”这虽然可能是后人故意夸大，但由此亦可以看到这种事情在时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故事记载陈寔的儿子陈湛曾经对荀淑的儿子们“说教”，这是汉末“清议”的重要史料。而荀淑儿子中的荀爽，后来成为颖川荀族中的第一个大学者，这是豪强变成士族的一个重要例子。

敢作敢为的豪强参加士大夫行列以后，使政治斗争激烈化。宦官的还击，是用同样手段于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在宫内谋杀了士大夫的领袖窦武。往常，士大夫在首领被杀之后便一溃而散。但这次窦武、陈蕃被杀前后，却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反抗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大多是此二人部下所吸收的“士大夫化的豪强”和“豪强化的士大夫”所组织的。

事变以后的党锢便更残酷了。士大夫的重要份子死在狱中有百余人，其余被陷害死废逃亡者更多。地方政府受命调查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黑名单牵连及于五族。在这次党锢下，士大夫的反抗行动大概有两种。一是从学术宣传上反抗——荀爽走的就是这一路线。他一面逃亡，一面著书立说，利用儒家经典，作反抗宣传，尤其是借《易经》里的“象数”，攻击

失道的君主，鼓吹革命。二是秘密组织联络逃亡的士人——当时秘密组织的四个领袖是：荀爽的侄子荀彧（代表地方势力）、何颙（大学生领袖）、袁绍（贵游公子），及曹操（官吏子弟）。他们联络四方有力人士，并私入洛阳首都援救受难党人。

与党锢之祸有密切关系的是黄巾之乱。黄巾和党人的关系可以从几个角度去探讨。第一，荀爽用《易经》“象数”反对朝廷，张角则用宗教；《易经》象数和道教有密切关系；而且郎顗用“星数”反对朝廷，和襄楷把道教《太平经》献给朝廷时攻击后官的话，与荀爽的议论很相似。荀爽《易》学流行的地方，很多即是后来黄巾作乱的地方；在颍川讨伐黄巾的将领，出京时军力很薄弱，而皇甫嵩及朱俊有许多募来的“精勇”和“家兵”，王允则请荀爽做从事（参谋）；黄巾军气势虽然浩大，但几个月便被平定，投降的人数高达数十万。这期间，平乱者和作乱者的关系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黄巾平定后，地方士族的势力大胜。到最后一次宦官在元熹元年（公元189年）谋杀士大夫首领何进，反宦官的士族领袖袁绍便带兵入宫，把宦官全部诛杀。

这次事件引起中原大混乱，直到后来荀彧和曹操合作的政权迎接汉献帝、定都于许昌（就在荀彧故乡附近），才渐渐稳定下来。在许昌的汉廷中，荀悦任皇帝的秘书长（秘书监），荀彧任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尚书令），荀攸任曹操军政府的参谋长（军师祭酒），在中原的士大夫，多数与他们有很深的关系。魏晋很多名士族的父祖们，早期大都是荀氏提拔引进的，其中包括西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

汉末以后的学术，大家都知道“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正始清谈”、王弼和郭象的“易”学，以及老庄之学。一般认为，汉末以后学风的转变，受了南方“荆州学派”很大的影响。这种说法的根据是荆州经学的“清简”作风，而王弼的先代王

畅、王粲都在荆州居住过。其实，“清简”的作风，以及在《易经》上扬弃“象数”、注重“义理”这两点，荀家的荀爽在王弼之前就说过。荀爽说“六经虽存，皆圣人之糟粕”，要大家注意圣人的精意，不要墨守复杂的经文；他还喜欢讨论《易经》的“意”、“象”、“辞”、“言”。不过，荀爽的时代比王弼早不了多少，可能也受到荆州学派的影响。但学风的转变，和注意《易》、《老》、《庄》玄学，早发生在荀氏的第一代大学者荀爽和第二代大学者荀悦之间。这二人都在曹操征服荆州，吸收荆州人才到许昌之前便早已死去，他们叔侄之间学术传统之转变早于荆州学派。荀爽是经学家兼史学家，荀悦则是史学家兼“哲学家”。荀爽不但遍注五经，而且曾“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荀爽不但利用经学在大原则上批评政府，还从实际史事的成败上去着眼。荀悦在学术上是继承荀爽的，但他不再继承荀爽的经学，而是用经学的精神注意史学。后汉的经学因论战的关系而注意简明的“条例”。早在东汉初年的郑众，就写过《春秋杂记条例》，而且在章帝时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后来写经书条例的人更多，荀爽亦写过《春秋条例》。荀悦作《汉纪》，在序文和篇首都有极精要的“条例”。

荀悦作《汉纪》，一般都认为完全是根据《汉书》，但《汉纪》的记载有和《汉书》不同的地方，大家又认为他所根据的是《汉书》古本，所以不同。其实，荀悦除了《汉书》以外，还根据了荀爽所著的《汉语》。荀爽对汉廷攻击得很厉害。荀悦《汉纪》中对汉廷也有很严厉的批评。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早年受党锢祸害的影响，也可能是保存了荀爽先前在“清议”运动时代的议论。但荀悦作《汉纪》是善意的，而且受到汉献帝的鼓励和支持。他写《汉纪》是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开始，建安五年成书。那时，汉廷刚在许昌恢复，大家都希望看到中兴。荀悦一方面盼望汉室的中兴，所以在《汉纪》里处处把献帝与光武帝相

比；一方面又怕汉室重蹈旧日的覆辙，所以又保留了对政事的严格批评，作为鉴戒。

为什么荀悦放弃了经学（他12岁便通经书）而专注于史学呢？在《汉纪》和《申鉴》里，他自己有明白的解释。他说，经书是远古的东西，不但文义艰深，而且解释不一致；圣人已死，不能起诸地下而质疑，所以引起的争论愈来愈多，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历史（尤其当代史——汉史）则不同，它是有事实为证据，而且大家经验犹新。因此，荀悦认为关于历史的议论可以“质诸事实而不诬”。由“经”而至“史”，由《汉书》的“文繁难省”而至编成《汉纪》三十篇，正是“清简”的学术路线。

荀悦遗留下的第二种作品是《申鉴》，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成书。《申鉴》的文章、风格和内容与《汉纪》有很大不同。因此，宋朝的黄震便怀疑《申鉴》“文风卑弱”，可能不是荀悦的亲笔作品。经过了相当复杂的考证工作，我认为《申鉴》不会是伪造的。但《汉纪》的文笔明朗，立论严肃，而《申鉴》则文笔玄奥，态度含糊。为什么同样一个人的作品，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原因之一是政治压力。曹操在建安五年杀了汉献帝的岳父董承，诛其三族，连已有孕的董妃亦遇害。在朝的议郎赵彦偶然和献帝陈言时事，便立即被曹操杀害。破袁绍以后，曹操更不把汉廷放在眼里。在这种形势之下，荀悦说话便不能太过明朗。

另一个原因是政治的反省。士大夫以汉末“清议”运动中极端反对朝廷的结果，弄得大家国破家亡，这是不是自取其咎呢？而且既然中兴无望，又何必再对汉廷苛责呢？这可能也影响了荀悦的论调。

最重要的原因是学术思想上的反省。世事的成败是非，是不是真的像历史记载的那样简单，那样容易批评呢？道理是不是只有一条呢？抑或是错综复杂，永远弄不清楚呢？荀悦自己在《申

《申鉴》上也写过：“文章应是辞达而已”，“但圣人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幽深玄奥呢？正是因为世事多是幽深玄奥，所以圣人的话也变成幽深玄奥的了”。因此，荀悦最后也放弃了“论史”而研究“哲理”了。

由严肃而变为含糊，由明实而变成幽深玄奥，这是六朝学风的趋向。世界上有些问题只能用问题来解答，阮瞻的“将毋同？”乐广的“至而不至”，都可以从《申鉴》里找到一些痕迹。荀悦的两本著作，前一部《汉纪》，可说是结束了汉末的“清议”；后一部《申鉴》，可说是开启了六朝的“清谈”。

以上是笔者当年撰写本书英文稿时的一些主要想法。晋北高专诚君在近两年间花了很多宝贵时间和心血完成本书中译，在此敬致万分谢意。英文中译，在思维方式和文笔风格上，必然有若干难以契合之处，因此藉着作序的机会，把原著的基本构思摘要重述，向国内读者请教。

陈启云

1998年岁末

【荀氏家族谱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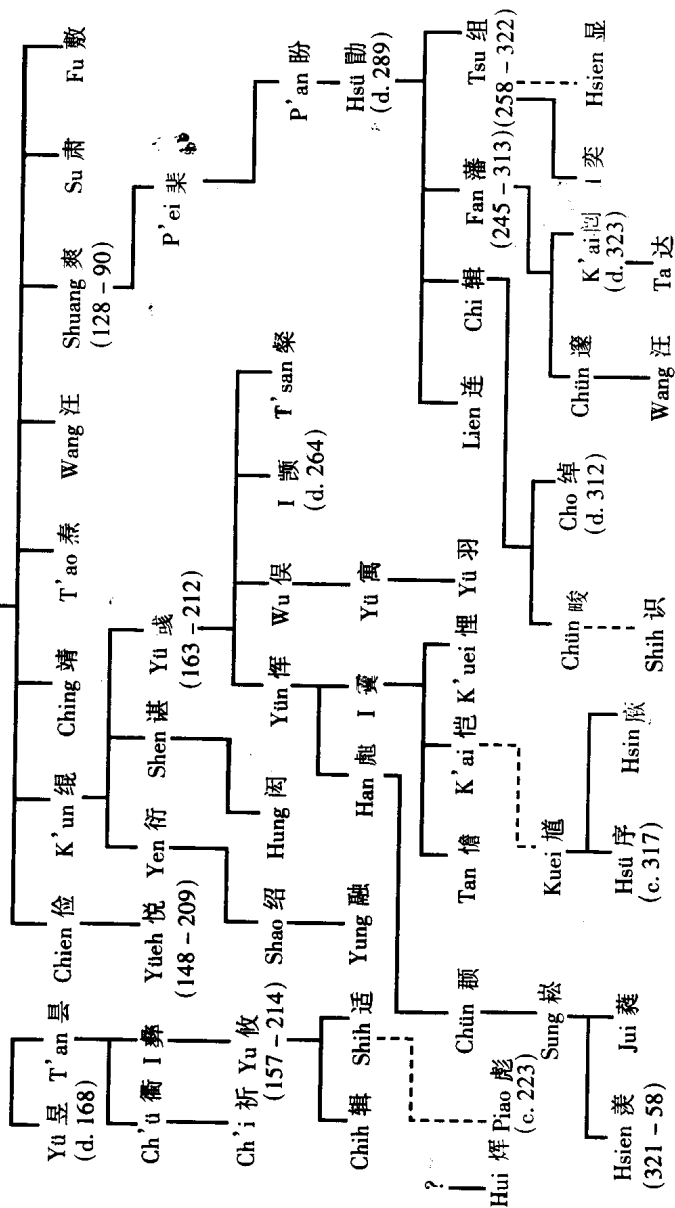
(颍川荀氏八代重要成员)

(?)

(约卒于公元121年)

(Sui 遂)

(Shu 淑)



以上“荀氏家族谱系图”根据的是《世说新语》中汪藻的“世说序录”，并与正史的记载相互参照。亦参考了矢野主税（1960，14-18）与好并隆司（1956，69）的论著。

目 录

英文版自序

中译版自序

荀氏家族谱系图

一、导言：历史剧变时代的儒士精英

二、帝国的崩溃和新的精英

1. 保守政权下的儒士
2. 迫害、抗争和颍川的荀氏家族
3. 儒生、道士和黄巾军

三、汉魏之间的转变

1. 内乱与“中兴”
2. 官僚体制、政治忠诚和新的领袖
3. 建安时代早期，公元 196-210 年

四、荀悦：家庭背景，仕途经历，政治态度

1. 公元 196 年之前的归隐时期
2. 在“中兴”后的汉朝廷供职，公元 196-209 年

五、荀悦的著作：《汉纪》

1. 官方辩护书
2. 史学家的议论（“史论”）
3. 宇宙论、经典权威以及历史考察
4. 历史编纂学

六、荀悦的著作：《申鉴》（引申的反思）

1. 从历史的考察到哲理的反思
2. “清谈”思潮中的儒学与道家思想
3. 儒学、法家思想以及荀悦的论议

七、结语：荀悦之后的世界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译者后记
